

ZHUOYA
HE
SHULA
DE
GUSHI



柳·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著

少年版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卓娅和舒拉的故事



卓娅和舒拉的故事

书 名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
原 著 柳·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
缩 写 郁 平 古 承 姚 健
责任编辑 郁敬湘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14F, 15F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南京东海印刷厂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5.25
印 数 10,001—15,000 册
字 数 108 千字
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2 版
2001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—5346—2206—9/1·442
定 价 7.00 元
(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个乡村名叫“杨树林”。老人们说，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片密林。可是在我的童年时期，人们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记了。

我们的乡村很大，居民约有五千人。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、平兹，甚至到莫斯科去做工挣钱。可怜的一小块地是不够养活全家的。

我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。父亲在村公所当文书员。我上过三年当地的乡村小学，1910年秋季，考进了基尔山诺夫城的一所女子中学。因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，需要我帮助父母，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。

我刚回到家，我的哥哥谢尔杰就对我说：“新生活开始了，柳芭，你明白吗？是完全的新的生活。我不愿意袖手旁观了，我要参加红军去。”

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，我是在基尔山诺夫就得知了的。老实说，那时候我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仅记得有一种欢欣的感觉：一个盛大的群众的庆祝节日来临了。城市里充满了热闹和狂欢的气氛；红旗迎风飘扬着。在大会上普通的人——士兵、工人——登台演说，响亮地说出新的充满着信心和果敢的字眼：布尔什维克党，苏维埃，共产主义……

“哥哥，我能干什么呀？”我问他。

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：“教书呀！当然是教书。你知道吗？从此以后学校就要像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。你以为今后在杨树林还依旧只有两个学校供五千人口用吗？不能那样了！以后人人都能上学。你看吧，人民不能再过文盲的生



活了。”

两天后，他就参加红军去了。我也不迟疑，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，他们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初级班教员。

在索罗维延卡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。从新学年开始就调到杨树林来了。

回到杨树林后，我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。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过一年兵役，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和图书馆。不久，我们就结了婚。

我和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，很和睦。他是一个有涵养、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，但是我在他的每一次顾盼、每一个举动中感觉到他对我的关怀，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能互相了解的。在知道了我们就要有孩子的时候，我们非常高兴。“一定是儿子！”我们这样断定，并且共同给孩子起了名字，还预测了他的未来。

孩子生下来了。

“恭喜，柳鲍娃·彼得罗夫娜，得了一位千金。”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。在这一瞬间，我觉着我一向没有盼望过儿子，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儿。

“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。”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说。

我同意了。

这是1923年9月13日。

一个严寒的冬天，连老年人也不记得有哪个冬天曾这样



冷过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、暗淡的：当我们听到了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时候，周围的一切都暗淡了。他对于我们不只是领袖和伟大的、出众的人。不，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；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，全是和他联系着的，全是由他发动起来的。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。

从前，在我们那里只有两所小学，现在超过十所了，这是列宁建立的。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，现在人民站起来了，强壮了，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。我们因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？电影院也出现了；教员、医生、农业技师和农民们恳谈，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；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。农村迅速地壮大了，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。以前不识字的人，现在学会识字了；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。这一切全是怎么来的呀，谁给了我们新生活呢？对这个问题，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，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：那就是列宁。

可是突然他不在了……这是意识中忍受不了的事，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人事。

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，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。

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《真理报》，在2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。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给大家听。屋子里面，人挤得水泄不通。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大家的心。

阿那托利读完之后，报纸就在人们手里传递着：每个人都



想亲眼看看、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、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。

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保存起来了。

当时我想：“女儿长大了，让她看看吧。”

卓娅还没满两周岁，她的弟弟舒拉就诞生了。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。他喊叫的声音很粗，一哭起来就不停。他要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，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，头发也是黑的。

在卓娅满6周岁的时候，我和丈夫决定到西伯利亚去，像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所说的那样：“看看人去，见识见识世界去。”

我们来到了叶尼塞省的康斯克城。这是一个小城镇，房屋都是一层的，木头的，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头铺的。我们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馆，随后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选择可以在一个学校任教的乡村。他们派我们到西特金村去。

我们在西特金住的房子，建筑在很高的河岸上，下边是一条很宽的河，水流得很快。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些头晕，似乎自己也会随着水漂流到什么地方去。

有一次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决定要教会卓娅游泳。他拉着她游离了河岸，后来忽然把她丢开了。卓娅沉下去喝了一口水，冒上来，又沉下去了……

我在岸上吓得半死。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在她身边游着，他是很好的游泳家，自然无需担心孩子被淹死；可是看着她喝水，看着她不断地沉到水下面去，毕竟是可怕的。我记



得，她一声也没喊叫，她用尽全力抵抗着和挣扎着，但不做声。后来父亲就抓着她，带她游到河岸来。

“好种！再有两次就会游泳了！”父亲这样确信地说。

“害怕吗？”我一边把她身上擦干，一边问她。

“害怕。”她坦白地说。

“我们还去游泳吗？”父亲故意问她。

“还去。”卓娅坚决地回答说。

有一次卓娅问我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，羊也那么多，还有许多马和牛啊？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？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，还有老奶奶、老爷爷，而房子却那么破、那么小，不但没有牛，连一只羊也没有？”

这样，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：什么是贫、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。对6岁的孩子讲这样的问题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，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。可是生活逼迫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。

这是在1929年，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7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。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。7口棺材从街上运过的时候，我正在台阶上站着。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，慢慢地、但是庄严地奏着“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”。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葬的群众，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。

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：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，她惊惧地看着街上。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



着我的手，紧紧地靠着我，很久地张望着远去的送葬队伍。

“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？富农是什么人呀？您是共产党员吗？爸爸是共产党员吗？不会把你们打死吗？杀人的凶手找着了么？”

不只是卓娅，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。7个共产党员的殡葬，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。

在5月里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。他们在信里写道：“你们到莫斯科来吧，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。我们很想念你们，我们想和你们见面，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。”

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，学年刚一终了，我们就离开了西伯利亚，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，然后我与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去了莫斯科。

第二年8月底，我们把孩子们也接到莫斯科来了。

孩子们登上了电车——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！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、铃声不住地响的电车里，在莫斯科奔驰着，经过了高楼大厦，驶过了华丽的汽车，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。孩子们的鼻子始终贴着玻璃窗。

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，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子。我们上了第二层楼，进入一间小屋：桌子、床、不很宽的窗户……看吧，我们到家了。

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，是一生中最好的日子。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得那一天。我也记得。这是



1931年9月1日。这天是晴朗无云的。齐米列捷夫的树木满披着金黄色的叶子。落叶在脚下沙沙地响着,打着什么神秘的、鼓励人的耳语,可能是说,我的孩子们的新的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
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。在那一年我教“预备班”,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。

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从我的班里拨到另一班里去了,原因是这样的:

卓娅是很能抑制感情的,她绝对不表示出和我的至亲关系来。有时候她称呼我“柳鲍娃·齐莫菲耶夫娜”,她这样称呼我,是要说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,而我对于她也是和对一切其他人一样的教员。可是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。在上课的时候,他等着室内完全安静的当儿,就突然大声地喊我:“妈妈!”他并且在这时调皮地瞥着周围。

舒拉这样的举动,是会引起骚动的:教员,柳鲍娃·齐莫菲耶夫娜;忽然又是,妈妈!这事很使孩子们开心,但是却妨碍工作。一个月之后,只好把我的孩子们拨到并列的另一班里,到另一位女教员那里去。

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习功课上了。回到家里,吃完饭,她马上就坐下来做功课,向来不需要催促她。学习,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,是最感兴趣的事,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。

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做功课。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。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在地不淘气地做功课太寂寞,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功课变成游戏。有什么办法!他还没满7周岁呀。



11月7日,我的孩子们不待天明就起床了:父亲允许带他们去参加游行,他们早就焦急地期待着这一天。

这天早饭他们吃得特别快。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开始刮脸。孩子们捺不住性子等待他把脸刮完,他们也曾试着暂时做一点什么游戏,但是总玩不起来。

我们终于穿好衣服来到街上了。这一天的天气很讨厌,刮着风,落着一半是雪的小雨。可我们走出还不足十步,节日的音乐、歌声、说笑的声音就在前边沸腾了。愈接近市中心,街上愈热闹,欢欣鼓舞的情绪愈浓。不久之后雨也停了,可是孩子们和成人们都没去看天,只留意遮天蔽日的红旗和周围的鲜艳颜色。

刚看见最前面的游行队伍,卓娅和舒拉就狂喜起来了。他们大声地读着每一条标语(当然读得不太流畅),他们和着每个歌咏团唱歌,随着每个乐队的乐声开始舞蹈。他们不是自己往前走,而是被节日的浩大的沸腾的浪涛卷着走的。他们的脸发红发热,眼睛闪着光,帽子溜到后脑勺去了(因为要始终看上边);他们不能说一句连贯的话,而只是喊叫:

“你看,你看!装饰得多么好,看那个红星!看那里,看那里!看气球飞啦!快看哪!”

我们走近红场的时候孩子们就静悄悄的了,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儿。

“妈妈,那里都是谁呀?”舒拉不知为什么那样小声地问我,同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“那里有斯大林吗?有伏罗希洛夫吗?有布琼尼吗?”



……红场呀！这两个字联系着多少思想、多少感情啊！我们在杨树林曾怎样地梦想着看见它的那一天呀！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！世界上多少万万人民的思想都向着这里……一年以前，我初次来到莫斯科的时候，就到红场来了。我读过很多关于它的文章，听了很多关于它的传说，可是我仍旧没能想到它是这样朴素和伟大。但是现在当举行盛典的时候，我却觉得它完全是新鲜的。

我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垛口和钟楼，革命烈士墓前庄严肃穆的青松和镌刻在大理石上的不朽的名字——列宁。

无尽头的人的洪流，不断地流着，流着，它的热潮冲洗着朴素庄严的墓壁。我觉着人类的整个信心、希望和热爱都像无尽的海浪一般，向这里，向指示未来道路的灯塔，涌来了。

有人在我们的队伍里大声地喊道：



“斯大林同志万岁！”

斯大林同志微笑了，并向我们招手。雷声一样的“乌拉”声震撼着红场。舒拉已经不是走着，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着。卓娅也紧握着父亲的手向前跑着，跳着，并且高高地挥着那只空闲着的手，好像她以为斯大林同志从检阅台上真的能看见她似的。

我们走向了沿河街。太阳忽然从云中现出来了，水中映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和古代教堂的金顶，水面荡漾着金光。

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，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，地址是亚历山大路7号。

我们的小楼是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的，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，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。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。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：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、光亮，也更宽敞。

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：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，学习着。在星期日我们就去“发现”莫斯科的新的角落：我们或到猎禽场，或到莫斯科河对岸，或乘2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，或到无愁园散步。

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，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。

我们就这样知道了莫斯科的许多“墙”、“门”、食堂胡同、台布胡同、榴弹胡同、早胃街、狗场等等的来历。

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斯尼亚(莫斯科市地名)冠上红色的字样，为什么有巷垒街和起义广场……他



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美妙的首都的历史,孩子们学会了如何理解和爱它的过去和现在。

有一次,在2月底,我们买了马戏团的入场券。我们并不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团去,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们看来真像是过节一样。

整整一星期的谈话都是关于马戏团的。但在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,我看见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已经在家中,并且躺在床上。我很惊讶。

“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早?为什么躺着?”我惊恐地问他。

“你不要担心,一会儿就好。也不过就是觉得不舒服……”

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:我看见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十分苍白,并且马上就憔悴了,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重病。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,惊恐地看着父亲。

“你们只好自己到马戏团去啦!”他勉强微笑着说。

“没有你,我们不去!”卓娅坚决地回答说。

“我们不去!”舒拉响应着。

大夫诊视了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之后,简短地说道:“肠扭转。马上到医院去。需要动手术。”他留下陪伴病人,我跑去找汽车。半小时之后,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已经被运走了。

手术进行顺利,可是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并没觉得轻快。每次我走到病房里的时候,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:我见惯了丈夫的喜欢与人谈笑的轻松愉快的个性,可是现在他默默无语地躺着,仅仅有时抬起他的枯瘦无力的手,默



默地放在我的手上，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指头。

3月5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。

在前厅里，一个相识的卫生员异乎寻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说：“您等一会儿，护士马上就出来。也可能是大夫。”

一分钟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。

“您坐一会儿吧。”她躲避着我的视线说。

我马上就明白了。

“他……死啦？”我说出了这样不可能的、令人难以相信的话。

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……一个亲人，即使他罹病很久并且预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，如果失去了他，家属也是痛苦的、难过的。至于像这样突如其来的、无情的死，我觉得是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……从幼年就向来没害过病的人，一星期以前还饶有精力，活泼，高兴，现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，成了叫不应、冷淡的、躺在棺材里的人了。

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：卓娅握着我的一只手，舒拉握着另一只手。

“妈妈，您别哭！妈妈，您别哭！”卓娅用发红了的无泪的眼睛看着父亲的僵硬的脸，重复着说。

……在一个寒冷暗淡的日子里，我们三人一起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待着我的哥哥和姐姐：他们要来参加葬礼。我们站在一棵像冬季那样枯槁的大树下，寒风阵阵吹着我们，我们感觉我们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。

我不记得我的亲戚是怎样来到的，也不记得我们怎样度



过了这冰冷的、惨痛的、难熬的一天。只是模糊地记着怎样走到墓地，卓娅突然绝望地大声哭号，后来就是土打在棺材盖上的声音……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的生活就骤然变样了。关心两个孩子的命运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的责任，整个地落在我的肩上了。

舒拉毕竟还年幼，发生了可怕事件他还不能十分了解。他以为父亲只是像过去的离别那样到远方去，将来还能回来……

可是卓娅却像成人一样地体会了我的悲哀。

她差不多永远不提起父亲。她看见我沉思，就走近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小声地说：

“我给您读一段书好不好呀？”

或者她请求：“给我讲一点儿什么吧！讲讲您小时候什么样儿……”

或者挨近我坐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紧紧地贴着我的两膝。

她尽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。

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间却听见她哭泣。我走到她身边，摸摸她的头发，小声地问她：

“你是想父亲了吗？”

她总是回答：

“不是，可能是我做梦啦。”

……我们在过去就对卓娅说过：“你是大孩子，看着舒拉，帮助妈妈。”现在这些话充满了新的意义：卓娅确实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。



我开始在另一所学校里兼课，所以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。在前一天晚间我把第二天的中饭做好。在吃之前卓娅把它热一下。

有一次我回到家来天很晚了，头疼，并且疲倦得没有力气做饭了。我就想：明天我再做饭吧。早些起床就是了……

我的头刚落在枕头上，就睡着了……第二天早晨醒得不仅不比平日早，而且更晚；为了不迟到，过半小时就得从家里动身。

我十分懊丧地说：“这可糟啦！我怎么会睡过了呀！今天你们只好吃干的了。”

晚上回到家来，刚迈进门坎我就问他们：

“怎么样，你们都饿坏了吧？”

“我们真的不饿，我们真的是吃饱了！”舒拉胜利地在我眼前跳跃着，喊着说。

“快坐下吃饭吧，妈妈，今天我们吃煎鱼！”卓娅庄重地宣布说。

“鱼？什么鱼呀？”

炒勺里确实有一条热气腾腾的煎得很香的鱼。从哪儿来的呀？

我的惊讶使孩子们很得意。

舒拉继续跳跃着，卓娅也很满意，终于她对我说明了。

“您知道哇，我们在经过水池子上学去的时候，往凿开的冰窟窿里看了看，看见里边有鱼。我们捉了很多。回到家里我们把鱼煎了，自己吃了，也给您留下了。很好吃，是不是呀？”